

# 明武宗親征應州史事考

## ——兼論《明武宗實錄》的書寫特徵\*

孫 岩\*\*

正德十二年，明武宗親征應州，逼退蒙軍。《明武宗實錄》的修纂者認為此戰所費不償、戰功甚少且「乘輿幾陷」。但綜合《實錄》的自相矛盾及各方材料所記，可知「乘輿幾陷」並非事實，其傷亡情況亦有諸多疑點。由於武宗等人要為正德朝的「失德」負責，且應州封功確有冒濫，加上京城曾有皇帝被俘的訛言，於是文官們順此思路，淡化了前者的功績。而世宗為塑造新政及其父子的權威，文臣們又欲借此清洗政敵、重拾威望，使得《明武宗實錄》以揭露武宗的負面形象、批判各類「改制」之事、強調文官的正直與遠見為主要傾向。這體現《實錄》主、客觀性交織的特點，也反映出正、嘉兩朝的政治變動，以及世宗和文官集團所欲塑造的前朝記憶。

關鍵詞：應州之役、《明武宗實錄》、明武宗、歷史書寫、嘉靖新政

---

\* 本文獲中國人民大學 2023 年度拔尖創新人才培育資助計畫資助。本文蒙吳琦、楊念群等先生悉心指導。兩位匿名審稿人的意見令筆者獲益良多，謹致謝忱！

\*\*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候選人；Email: sunyan9512@163.com。

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1505-1521 在位）被認為是明代個性最鮮明的皇帝，其行為活動頗受學界關注。<sup>1</sup>關於他親征應州，古、今評價皆有分歧。<sup>2</sup>《明武宗實錄》形塑了人們對武宗及應州之役的負面印象，正如謝貴安所言：「誰掌握了《明實錄》修撰的控制權，誰就掌握了對與己有關的前朝君臣和當朝臣僚進行褒貶的權力。」<sup>3</sup>事實上，《明武宗實錄》對應州之役及武宗等人形象的書寫，和朝廷的政治變動緊密相關，與其說它反映了歷史的真實，倒不如說是一種歷史敘事。雖然李洵曾懷疑過《明武宗實錄》對應州之役戰果的記載，<sup>4</sup>但並未進行深入地考證。筆者認為，全面考辨《明武宗實錄》關於應州之役的內容與書寫傾向，<sup>5</sup>有助於我們把握實錄及正德、嘉靖朝的政治動態。本文擬在此視野下，以應州之役相關史事的考辨為中心，比對不同史料，剖析正、嘉兩朝君臣的心理，對此戰記載中的疑點、影響書寫應州之役的因素及《明武宗實錄》整體的書寫特徵作一探究。

<sup>1</sup> 李洵的《正德皇帝大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是目前較全面考察武宗生平的著作。另外，有學者以「問題皇帝」概括明代幾位面臨角色衝突、角色失範的君主，武宗即屬此列。參見吳琦、趙秀麗，《明代「問題皇帝」研究——一項基於社會類群的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 27。

<sup>2</sup> 典型者如于默穎認為武宗將敗仗粉飾成大捷，冒濫軍功，以致邊防大壞；李洵則肯定武宗親征對增長明軍士氣的積極效應。于默穎，《明蒙關係研究：以明蒙雙邊政策及明朝對蒙古的防禦為中心》（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5），頁 60；李洵，〈讀《明武宗實錄》條記〉，《明史研究》，1（1991），頁 131-140。

<sup>3</sup> 謝貴安，《明實錄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 24。

<sup>4</sup> 李洵曾明確表露出對應州之役傷亡數及「乘輿幾陷」的懷疑。見本文第一部分與李洵，《正德皇帝大傳》，頁 95。

<sup>5</sup> 黃雲眉、謝貴安對《明武宗實錄》的敘述基調均有涉及，但尚未展開。黃雲眉，《明史考證·武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148-163；謝貴安，《明實錄研究》，頁 148-150。目前學界對《明實錄》存在的諱飾與塑造情況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武宗朝前。參見謝貴安，〈試述《明太祖實錄》對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學術研究》，5（2010），頁 97-105；謝貴安，〈試述《明太宗實錄》對建文帝形象的描寫與塑造——兼論傳統史學的曲筆與直書問題〉，《學習與探索》，1（2011），頁 219-222；蔡果利，〈試論《明實錄》對劉瑯的書寫——兼談《明實錄》編寫之失〉，《中國典籍與文化》，4（2016），頁 40-49。

## 一、《明武宗實錄》對應州之役的書寫

應州之役發生於正德十二年（1517）十月，始纂於嘉靖元年（1522），完成於嘉靖四年（1525）的《明武宗實錄》是現存最早完整記載此戰的史料。首先需詳解戰況。由於《實錄》的記載不長，且戰爭過程緊湊，為確保史料的完整性與連續性，先於此展示，再做分析。據《明武宗實錄》載：

〔正德十二年冬十月〕丁未，上親督諸軍禦虜於應州，虜遁，駕還駐大同左衛城。先是，虜五萬餘騎營玉林，將入寇，上在陽和，聞之，命諸將分布要地。大同總兵官王勛、副總兵官張輓、遊擊陳鈺、孫鎮軍大同城，遼東左參將蕭滓軍聚落堡，宣府遊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參將楊玉、延綏參將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奎軍平虜，遊擊周政軍威遠，時九月戊戌也。既而，虜分道南下，營於孫天堡等處。勛、輓、鈺、鎮率所部禦之，上命春、滓往為之援。政、奎及大同右衛參將麻循、平虜城參將高時尾虜後，又亟調宣府總兵官朱振、參將左欽、都勳、龐隆、遊擊靳英俱會陽和，參將江桓、張景為後應。十月甲辰，勳遇虜於繡女村，督軍步戰，虜南循應州而去。明日，輓、鎮、鈺與勳復遇虜於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頗有殺傷。薄暮，虜傍東山而退，仍分兵圍勳等。比曉，大霧，圍乃解，勳等入應州城，奎及守備左衛城都指揮徐輔兵至。又明日，勳等出城，遇虜於澗子村，大戰。滓、春、政、時、循等兵亦至，虜以別騎迎敵，我軍不得合。上乃率內外提督、監督太監張永、魏彬、張忠、都督朱彬及（朱）振、（陶）杰、（楊）玉、（左）欽、（都）勳、（靳）英、（龐）隆、（杭）雄、參將鄭驃等兵自陽和來援，眾殊死戰，虜稍卻，諸軍乃合。會暮，即其地為營壘，乘輿止焉。明日，虜來攻，上復督諸將禦之，自辰至酉，戰百餘合，虜乃退。明日，引而西，上與諸將且戰且進，追至平虜、朔州等邊。上復進兵，會天大風黑霧，晝晦，我軍亦疲困，乃還。復令勳及巡撫

僉都御史胡瓚以捷聞於朝。是役也，斬虜首十六級，而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輿幾陷。<sup>6</sup>

《實錄》中所見應州之役的戰況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兩軍最高統率直接參戰部署。蒙古由達延汗（1474-1517，1480-1517 在位）率領，<sup>7</sup>他曾征服蒙古右翼，「降服戰敗之眾於治下」，「掌領太平大政之間」，被喻為蒙古「中興之主」。<sup>8</sup>明軍由武宗朱厚照統領，明十六帝中曾親征者僅有五人，除去明初的太祖（1328-1398，1368-1398 在位）、成祖（1360-1424，1402-1424 在位）、宣宗（1399-1435，1425-1435 在位）三位有為之君，其後二百餘年內僅英宗（1427-1464，1435-1449、1457-1464 在位）與武宗曾領兵出征。天子親征，可謂罕見，雙方君主的直接參與也使該戰的重要性大為提高。

第二，戰爭規模較大，持續時間較長。此役蒙古五萬餘騎，明軍未有確切數字呈現，但通過武宗所調四鎮軍兵可估，兵力亦約五、六萬，雙方共有十餘萬人投入戰鬥。在戰爭時長上，雙方交戰 6 日，<sup>9</sup>日均戰鬥時間也較長，第五日雙方更是「自辰至酉」從日出戰到日暮，激戰 6 個時辰。對比幾場明軍大規模北伐的戰役，如土木之變，兩軍交戰時長不足 5 日；<sup>10</sup>薩爾滸之戰

<sup>6</sup>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 154，正德十二年冬十月丁未條，頁 2968-2970。

<sup>7</sup> 達延汗在史料中多作「小王子」，《明史》、《續文獻通考》等載：「小王子以五萬騎自榆林入寇，圍總兵王勛等於應州。帝幸陽和，親部署，督諸將往援，殊死戰，敵稍卻。明日復來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敵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值大風黑霧，晝晦，帝乃還，命宣捷於朝。是後歲犯邊，然不敢大入。」參見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327，〈韃靼傳〉，頁 8477-8478；[清]嵇璜等奉敕撰，《續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卷 249，〈四夷考〉，頁 4838；明人所記則多以「虜」稱之，如王圻續通考：「九月，上幸大同，獵陽和，虜以衆數萬掠應州，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參見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北京：現代出版社，1991），卷 123，〈王禮考〉，頁 1882。

<sup>8</sup> 參見 [明]佚名著，珠榮嘎譯，《阿勒坦汗傳》（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4），頁 24；[明]薩囊徹辰著，道潤梯步譯校，《新譯校註蒙古源流》（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卷 6，頁 321。

<sup>9</sup> 黃雲眉考證應州之役若以甲辰日始，應為六日。實錄自甲辰後連用明日而記，《明史》、《明紀》等未注意「薄暮」後的「比曉」字，僅以「明日」計則漏一日。參見黃雲眉，《明史考證·武宗紀》，頁 158。

<sup>10</sup> [明]陳文等奉敕撰，《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 181，正統十四年八月丁巳至八月壬戌條，頁 3496-3498。

則不足 7 日。<sup>11</sup>可知應州之戰在對陣兵力與交戰時長上皆達一定的規模。此外，若再考慮武宗於戰前調度大量餉銀與軍事資源，確可稱此戰是「十六世紀前後明、蒙之間一次較大的戰役」。<sup>12</sup>

第三，戰事較激烈、節奏快。雙方在這六日中既互有包圍、反攻，又有遭遇戰與混戰，局勢瞬息轉換。從描述戰況的「戰數十合，頗有殺傷」、「大戰」、「眾殊死戰」等看，亦可謂焦灼。尤其是第五日雙方於一晝內「戰百餘合」，而「乘輿幾陷」則更強調了此戰的凶險，以至武宗差點重蹈土木之變的覆轍。

第四，傷亡規模小。蒙方僅 16 人被斬首，明軍也只戰死 52 人，重傷 563 人。應注意，上述描述戰爭激烈程度的用詞分見於數日，即說明應州之戰中幾乎每日都有較激烈的廝殺。對於一場規模大、節奏快、激烈程度高，甚至「乘輿幾陷」的戰役而言，此傷亡數量顯然過小，完全不匹配該戰的描述情況。雖然明朝施行首級論功制，<sup>13</sup>以斬獲人頭和生擒敵軍數量為升賞標準，故斬首數常與實際殺敵數存在差距。但斬首 16 人和明軍的傷亡仍與此次戰況極不相配，這也是應州之役記載中的疑點之一，下文將對此展開討論。

除了以上關涉應州之役的過程與戰果外，《實錄》還記載此役在朝中所引起的政治爭論。正德時的封功及嘉靖朝的處置，事關此戰的評價，同樣不容忽視。得勝歸朝的武宗意氣風發，自言「親斬虜首一級」，<sup>14</sup>「朕統六師，親臨戰陣，率少擊多解應州敵，大展雄威，振揚士氣，全捷而歸」，於是在錄應州功時大肆封賞。《實錄》載：

錄應州禦虜功，升賞太監、總兵，……九千五百五十五人有差。……

冒濫者凡五萬六千四百四十九人，……六科十三道因言應州之役所獲

<sup>11</sup> 薩爾滸之戰自萬曆四十七年三月甲申（初一）至丁亥（初四）「凡四日而破三路明兵」，北路李如柏軍於五日撤軍。若從二月二十九日杜松攻戰為始，則為七日。參見〔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 580，萬曆四十七年三月甲申朔至三月甲午條，頁 10969-10983；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1，〈太祖本紀〉，頁 11。

<sup>12</sup> 李洵，《正德皇帝大傳》，頁 102。

<sup>13</sup> 對明代首級論功制的討論，參見張詳明，〈明代首級論功淺議〉，收入吳豔紅主編，《明代制度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頁 209-241。

<sup>14</sup>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 158，正德十三年正月丙午條，頁 3030。

不償所失。且其間未出國門而冒名者不可勝數，……乞賜宸斷，處以至公，俱不報。……軍功之濫未有甚於此者。<sup>15</sup>

此條可見封賞規模之大。然而，六科十三道言「所獲不失所償」，批評此戰耗資過甚。在應州之役開戰前，文官們就已對武宗下旨「發戶部銀一百萬兩輸宣府，以備賞勞」頗感不滿，認為「〔陛下〕固亦一念之仁，獨不計太倉之積今有幾乎？自奉旨以來，人言洶洶，或謂陛下期拔虜營，預為軍費，或謂左右之奸假此以結人心。果如前言，則己巳之變已有覆轍；果如後言，則堅冰之戒不可不謹！……俱不報」。<sup>16</sup>而武宗在戰後升賞無度的情況，更是進一步引起了爭議，《實錄》末句「軍功之濫未有甚於此者」，亦直接突出了此戰的負面影響。其後世宗亦強調「應州功次極為冒濫」，即位之初便下詔裁革應州軍功，除了「本邊官軍自斬首級例該升級外」，其餘皆由兵部與禮部查奏裁革。<sup>17</sup>至此，《明實錄》對應州之役的評價正式蓋棺。

需留意，《明武宗實錄》的撰修與應州封功的裁撤都是在與武宗及其寵臣有過激烈矛盾的楊廷和（1459-1529）等文官的主持下開展的，他們在書寫戰前的諫阻及事後的封賞時，均帶有否定傾向。雖有看似肯定武宗親臨前線、妥善部署的記述，但最後兩軍尷尬的死傷及「乘輿幾陷」的書寫，等於直接否定前文，同樣給此戰添上了失敗的論調。結合正德十年（1515）所定斬首「達賊功次」可知，<sup>18</sup>纂修官旨在突出此戰幾無戰功，恰好與後文「軍功之濫未有甚於此者」相呼應。同時，《明武宗實錄》中所載的大小戰役通常只記關乎軍功賞賚的斬首、俘敵數量，較少記載敵軍的具體傷亡，更少明載己方的死

<sup>15</sup>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164，正德十三年秋七月己亥條，頁3152-3153。

<sup>16</sup>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153，正德十二年九月庚子條，頁2962。《明史》載：「帝弗從，乃進其半。」即便如此，仍至少動用了五十萬兩太倉銀。[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190，〈石玠傳〉，頁5050。

<sup>17</sup> [明]張居正等奉敕撰，《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1，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條，頁24。

<sup>18</sup> 正德十年新定斬首「達賊功次」：「一人獨斬一顆，升實授一級，不賞。三人共斬一顆，為首者升署一級，為從給賞。四人、五人、六人共斬一顆，為首者給賞，為從量賞……。」參見[明]申時行等修，〔萬曆〕《明會典》，卷123，〈兵部六·功次〉（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631。據此標準，實錄中所記應州之役的戰功將極其微小。

傷。應州之役被如此書寫，帶有塑造其負面影響的導向。筆者贊同李洵對應州之役戰果及其敘述傾向的質疑：「這種論調中有多少事實根據是值得懷疑的，而且這種論調的背後顯見帶有某種政治傾向。」<sup>19</sup>

## 二、應州之役書寫中的兩大疑點及其考辨

應州之戰事關重大，除《實錄》外，明、清乃至朝鮮的史料亦有提及。<sup>20</sup>最早對應州戰情作出陳說的是內閣學士梁儲（1451-1527），他在戰後不久即奏請武宗回朝，並提到：「近日大同地方被敵人擁眾深入，直至應州等處搶掠，伏蒙皇上獨運神謀，分遣將士，追襲剿殺，擒斬數多，敵眾畏威，遁出境外。臣等始雖憂懼，既而不勝喜慰，意以為邊患既寧，回鑾有日。」<sup>21</sup>時任兵部尚書、掌握前線軍情的王瓊（1459-1532）亦多次表達對武宗親征應州的肯定（見表1與下文）。<sup>22</sup>其後，成於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皇明通紀》與萬曆初的《殊域周咨錄》，因其敘述風格、記敵八萬及未記「乘輿幾陷」等情況與《實錄》明顯不同，可知其可能並未參閱《實錄》。然而，稍晚的《弇山堂別集》，除個別字眼不同，在關於應州之役的各方面記述均與《實錄》高度相似。考慮到王世貞（1526-1590）曾依實錄著《史乘考誤》，則他對應州之役的記載很可能也源於《明武宗實錄》。其後的諸多史料與《弇山堂別集》在各方面也高度相似，<sup>23</sup>顯示這些史料的史源很可能就是《明武宗實錄》或《弇山堂別集》。因

<sup>19</sup> 李洵，《正德皇帝大傳》，頁95。

<sup>20</sup> 筆者原想以蒙古方面的史料輔助考察，然蒙文譯註的史料本少，所查也未見相關事宜。地方志中對此戰的記載同樣十分簡略，只提及武宗曾「幸陽和」與「親督諸軍尋邊，駐蹕大同。」參見〔清〕房喬蘭纂修，〔雍正〕《陽高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卷1，〈巡幸〉，頁38；〔清〕吳輔宏纂修，〔乾隆〕《大同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卷8，〈巡幸〉，頁140。

<sup>21</sup> 〔明〕梁儲，《鬱洲遺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2，〈請回鸞疏七〉，頁556。

<sup>22</sup> 梁儲為賢良正直之臣，王瓊則兼具經世濟國之才。被視為「異端之尤」的李贄對二人的品行也十分認可。參見〔明〕李贄，《續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17，〈經濟名臣·太子太保尚書王公〉，頁1223。

<sup>23</sup> 如《武備志》、《蒹葭草》、《國史紀聞》、《皇明史竊》、《國權》、《明書》、《欽定通鑑綱目三編》與《明通鑑》等。

此，後世對應州之役的記載幾乎都出自實錄系統，其書寫就很難脫離當中的內容與傾向。但一些史料中的微妙不同，透露出相異之聲。筆者在比對異同後，分類如下：

表 1 各類史料與《明武宗實錄》所載應州之役的不同之處（節選）

史料類別	內容差異	史料來源	成書時間 或最早版本	備註
奏疏類	①死傷記載不同	《鬱洲遺稿》	明正德十二年 (1517) 十月二十四日疏	當朝大學士梁儲奏：「擒斬數多，敵眾畏威」。
	②有積極評語	《晉溪本兵數奏》	明正德十二年 (1517) 十一月二十二日疏	當朝兵部尚書王瓊奏：「〔各部〕相機應援，處置周密，極為有備。……今賊雖已出境，倏忽復來入寇，亦未可知，尤當隄備。」
			明正德十四年 (1519)八月疏	王瓊奏：「前年虜入應州，幸遇皇上駐蹕陽和，揮戈一指，虜即退遁，……此則北虜畏懼皇上威武之明驗也。」
史志類	①死傷記載不同	《皇明通紀》	明嘉靖三十四年 (1555)成書	不載雙方死傷／死傷數所見的戰場不同。
		《殊域周咨錄》	明萬曆二年 (1575)成書	
		《續文獻通考》	明萬曆十四年 (1586)成書	
		《名山藏》	明崇禎十三年 (1640)刻本	
		《明紀》	清同治十年 (1871)刻本	
	②有積極評語	《武備志》	明萬曆四十七年 (1619)成書	是後雖歲犯邊，然罕大入／是後歲犯邊，然不敢大入。
	《名山藏》	明崇禎十三年		

③無「乘輿 幾陷」		(1640) 刻本	略
	《明史》	清乾隆四年 (1739) 成書	
	《〔欽定〕續 文獻通考》	清乾隆四十九年 (1784) 成書	
	《皇明通紀》	明嘉靖三十四年 (1555) 成書	
	《殊域周咨 錄》	明萬曆二年 (1575) 成書	
	《續文獻通 考》	明萬曆十四年 (1586) 成書	
	《名山藏》	明崇禎十三年 (1640) 刻本	
	《〔欽定〕續 文獻通考》	清乾隆四十九年 (1784) 成書	
	《明紀》	清同治十年 (1871) 刻本	

資料說明：

1. 奏疏類史料多只對應州之役做出評價，未記具體戰情，故筆者將其與記載較完整的史志類相區別。
2. 各書中尚有些許微妙差異，意義不大，故不詳列。

資料來源：〔明〕梁儲，《鬱洲遺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2，〈請回鸞疏七〉，頁 556；〔明〕王瓊著，張志江點校，《晉溪本兵敷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卷 3，〈為緊急聲息事〉，頁 112；卷 11，〈為預防邊患事〉，頁 441；〔明〕陳建，《皇明通紀》（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33，頁 1149，正德十二年九月條；〔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 18，〈韃靼傳〉，頁 621；〔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北京：現代出版社，1991），卷 123，〈王禮考〉，頁 1882；〔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65，〈親征考〉，頁 1225；〔明〕茅元儀，《武備志》（臺北：華世出版社，1984），卷 225，〈北虜考〉，頁 9682-9683；〔明〕何喬遠，《名山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卷 180，〈王享記四·韃靼〉，頁 3047；〔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327，〈韃靼傳〉，頁 8477-8478；〔清〕嵇璜等奉敕撰，《續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卷 249，〈四夷考〉，頁

4838；〔清〕陳鶴，《明紀》（上海：中華書局，1936），卷26，〈武宗紀三〉，頁20a；〔清〕夏燮，《明通鑑》（北京：中華書局，2014），卷47，正德十二年冬十月癸卯朔條，頁1798-1799。

以上幾類有關應州之役記載情況的不同，直接關乎對明武宗與此次戰役的歷史評價。筆者認為，不記雙方死傷或「乘輿幾陷」大多是作者有意為之。因相關幾部史料與《明武宗實錄》、《弇山堂別集》在各方面的記述高度相似，顯示這些史料參閱了後者。<sup>24</sup>在這些史料的記述中，雖無其他材料可顛覆《實錄》的數字，但作者可通過篩選或轉換重要字眼來表露自己的認知。如《武備志》雖總體承襲了《實錄》的內容，但肯定「是後虜雖歲犯邊，然罕大入」。<sup>25</sup>《名山藏》、《明史》與《續文獻通考》不僅直接未載死傷規模與「乘輿幾陷」，而且寫下「是後雖歲犯邊，然罕大入」的積極評語，顯然與《實錄》的論調不同。<sup>26</sup>《明史》肯定此戰或會招致懷疑，因為清帝並不否定尚武活動，且清聖祖曾針對「洪武、宣德本紀，訾議甚多」的情況，指示史臣不應過分別苛責明初諸帝，而應秉持「公論」。<sup>27</sup>後來殿本《明史》本紀的論贊部分，確實對明帝採取了相對寬容的評價標準。但清帝同時強調「失德必至喪亡」的鏡鑑，他們反對輕議的是明初的「令主」，對中晚明的帝王同樣多有批評，據此彰顯明朝漸失天命的過程。其實殿本〈武宗本紀〉的論贊亦以批評為重，乾隆朝修訂的四庫本《明史》對武宗以後諸帝的貶抑則更進一步，可知清朝上下並無回護武宗之意。<sup>28</sup>不過，湯斌（1627-1687）等《明史》編纂人員確實懷疑《明武宗實錄》的客觀性，也許是基於求真求證和秉持公論的

<sup>24</sup> 如《名山藏》記載武宗事宜最多的《典謨記》即明確「取自實錄」。參見商傳，〈名山藏點校前言〉，收入〔明〕何喬遠，《名山藏》，頁2。

<sup>25</sup> 〔明〕茅元儀，《武備志》，卷225，〈北虜考〉，頁9682-9683。

<sup>26</sup> 《明史·韃靼傳》作「是後歲犯邊，然不敢大入」，意同。《明史·武宗本紀》則載「〔上〕親督諸軍禦之，戰五日。辛亥，寇引去，駐蹕大同。」參見〔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327，〈韃靼傳〉，頁8478；卷16，〈武宗本紀〉，頁209。

<sup>27</sup> 〔清〕馬齊等奉敕撰，《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54，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丁丑條，頁700。

<sup>28</sup> 殿本和四庫本《明史》本紀論贊部分的不同及其史論變化，可參見喬治忠、楊豔秋，〈《四庫全書》本《明史》發覆〉，《清史研究》，4（1999），頁67-73。

考量，史官們並未抄下可疑的戰果，而是繼承肯定應州之役的明代史料。<sup>29</sup>此外，嘉慶年間成稿的《明紀》不僅不載「乘輿幾陷」，且其對傷亡的記述也耐人尋味：「辛亥，寇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先後斬十六級，官軍死者數百人。會大風黑霧，晝晦，帝乃還。」<sup>30</sup>作者陳鶴（1757-1811）將《實錄》所載傷亡情況前移了若干字符，使其指向出現變化，即斬蒙軍十六級、明軍死傷數百人為最後一日追擊敵人時的戰果，迥異於《實錄》將該數記為整場戰役的情況。陳鶴乃江蘇元和人，他受江南考據學風的影響，「為嘉定錢大昕所重」，其《明紀》「原本正史，而參以王氏稿，此外說部野史，間有採摭，必旁證核實，而後著之。凡新異詭誕之說，置不錄。論者以為有良史風」。<sup>31</sup>與清廷一樣，陳鶴也沒有回護武宗的訴求，只是在批判繼承前代史料的基礎上，融入了自己對應州戰況的考據和認識。因此，以上記載的選擇與細節的微妙之差，看似無義，實則可能暗含作者內心對應州之役的態度。加之梁儲與王瓊對應州之役的肯定，《明武宗實錄》中原有的幾點矛盾就更令人懷疑。

首先是戰爭激烈程度與戰果描述相悖。前揭雙方傷亡規模完全不匹配此戰規模大、節奏快、激烈程度高等情況。從死傷對比看，明方陣亡遠超蒙軍被斬之數，達三倍多，重傷 563 人，卻未見敵方的傷亡概況。成化至正德時的明蒙戰爭確有從殲滅戰向「治安戰」轉變的趨勢，但從雙方的兵力、交戰情勢及事後所載來看，此戰絕不同於小型的治安驅逐。王瓊曾上〈為緊急聲息徵兵防剿事〉，言及應州戰前十日，「達賊約有一萬餘騎，從彌陀山迤東往西行走，勢甚猖獗，比昔不同」，巡撫大同都御史胡瓚「乞要請發延、遼參將杭雄、蕭滓人馬並宣府奇遊兵三枝前來分布殺賊」，<sup>32</sup>證明此次敵軍的來勢令他們頗為警惕。而應州之戰共交火 6 日，期間雙方互有勝負，包圍、反包圍、遭遇戰與混戰交織，其中繡女村、潤子村與第五日的戰鬥尤甚，其激烈

<sup>29</sup> 《明史》修成後，也有完全擇信實錄所載戰況的重要史著，如夏燮《明通鑑》直言其延續實錄對應州之役的記載，「悉據書之」。〔清〕夏燮，《明通鑑》（北京：中華書局），卷 47，武宗正德十二年十月丁未，頁 1799。

<sup>30</sup> 〔清〕陳鶴，《明紀》，卷 26，〈武宗紀三〉，頁 20a。

<sup>31</sup>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72，〈文苑傳三·陳鶴〉，頁 5974-5976。

<sup>32</sup> 〔明〕王瓊著，張志江點校，《晉溪本兵數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卷 3，〈為緊急聲息徵兵防剿事〉，頁 111。

之描述不亞於《明實錄》中的其他大戰。「是後雖歲犯邊，然罕大入」的說法，也反向佐證此次達延汗是大舉入犯。然而，從結果上看，入寇者蒙方始終未能實現戰略目標。他們既沒能突破防線、未對明軍造成大的殺傷，也未像此前一樣成功掠奪多少財物。作為防禦者的明方則實現了戰略目的。若按《實錄》所記，蒙方僅被斬 16 人，然武宗「乘輿幾陷」，那麼，為何蒙方在此優勢下不乘勝追擊，而選擇全軍撤退，是頗可存疑的。對此情況有兩種可能的解釋。第一種解釋是蒙古出現內亂，急需返回。但明、蒙史料均未見相關事宜，且蒙古再次分裂是在達延汗死後，<sup>33</sup>適時達延汗是否已亡，此事蒙漢史料所記皆歧互不一，甚至有極大出入。<sup>34</sup>既然達延汗的卒年仍未有明確結論，<sup>35</sup>故難以據此解釋其退兵緣由。此外，蒙軍撤退後兩日又欲犯「暖泉溝」及「王林城西」等處，<sup>36</sup>證明蒙軍先前的撤退非因內亂，否則就不會在短期內還覬覦它地。只是該次入侵同樣因武宗率兵與部署得當，蒙方只得撤軍。

第二種解釋為雙方傷亡很可能大致相當，甚至使蒙方感到了壓力。此一說法符合各史料對戰況激烈的描述，也是目前最合理和可能的情况。梁儲、王瓊對武宗親征震敵的肯定，雖不排除有迎合聖心的可能，但這的確更符合各方材料對戰況的描述。王瓊認為「本邊不習步戰」，然「去年總兵官王勛在應州督軍下馬步戰，始能固守營壘，不為賊所蹂躪」，<sup>37</sup>肯定了明軍此前在繡女村的表現。王瓊在其兵部尚書的職權範圍內，深諳邊鎮軍情及其戰力強

<sup>33</sup> 參見〔明〕薩囊徹辰，《新譯校註蒙古源流》，卷 6，頁 321-350；〔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327，〈韃靼傳〉，頁 8478。

<sup>34</sup> 如《蒙古源流》載其「在位七十四年，歲次癸卯、年八十歲歸天矣」；《蒙古黃金史》載：「達延可汗四十四歲逝世。」〔明〕薩囊徹辰，《新譯校註蒙古源流》，卷 6，頁 321；朱風、賈敬顏譯，《漢譯蒙古黃金史綱》（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頁 99。

<sup>35</sup> 紀年較精密的《阿勒坦汗傳》（頁 24）提及達延汗於「瘦紅牛年四十四歲卒」，對應明正德十二年，薄音湖考得達延汗卒於該年。參見薄音湖，〈達延汗生卒即位年考〉，《中央民族學院學報》，4（1982），頁 70。一些明人史料多載達延汗卒於應州戰後的正德十二年十一月至十三年八月間。還有學者提出達延汗應卒於正德十一年，見寶音德立根，〈達延汗生卒年、即位年及本命考辨〉，《內蒙古大學學報》，6（2001），頁 4。明人記載參見〔明〕茅元儀，《武備志》，卷 225，〈北虜考〉，頁 9683；〔明〕何喬遠，《名山藏》，卷 180，〈韃靼〉，頁 3047。

<sup>36</sup>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 154，正德十二年冬十月辛亥條，頁 2970-2971。

<sup>37</sup> 〔明〕王瓊，《晉溪本兵數奏》，卷 4，〈為告領馬匹事〉，頁 128。

弱，所論當為中肯之言。且僅以五里寨之戰「頗有殺傷」的記述為例，就使蒙軍僅 16 人被斬顯得頗不合理。即便將這 16 人都視作該日的斬獲，也達不到「頗有殺傷」的程度。而包括《實錄》在內的史料都強調兩軍在此戰中「殺傷頗相當」，<sup>38</sup>既然該日殺傷相當，其後的大戰更加激烈，蒙軍又被逼退，那麼蒙古的死傷怎會如此之少？若認定此傷亡規模為真，則意味著明軍在五里寨「頗有殺傷」及第五日「自辰至酉，戰百餘合」的幾場大戰中的斬殺均在個位數，這顯然不合理，也與《實錄》所記戰況相悖。此外，在《實錄》記有敵軍傷亡情況的戰役當中，斬首數與實際傷亡的差距通常在十幾倍以上。如正德七年（1512）平定四川叛亂的一場戰役中「斬首千四百五十餘級，俘獲千八百餘人，踏死者又幾萬人」。<sup>39</sup>另有一場禦邊戰役「殺虜三千七百四十九人，掠頭畜二萬三千五百有奇。陣亡及被傷官軍三百八十一人，所獲虜首僅九級」。<sup>40</sup>據此參照，蒙軍在應州之役中至少應有數百人傷亡。《實錄》所載，突出蒙方被斬之少，以及明軍數倍於敵的死傷，有意或無意地湮滅了敵軍的傷亡情況。故幾乎可斷定蒙方的實際傷亡要遠超 16 人。<sup>41</sup>

總之，戰爭激烈程度與戰果描述間的矛盾到了不可共存的程度。以武宗的戰後反應及前文揭示的情況看，筆者認為在以大膽揭露武宗的《實錄》中，對戰爭激烈的書寫應當屬實，而傷亡數為假的可能性更大。退而論之，至少該傷亡數絕非整場應州之戰的，至多為其中某日或某場小戰役的規模。《明紀》所載提供了一種較可能存在的解釋：即《實錄》所載數字很可能是在明軍已逼退蒙軍後，於最後追擊敵人時的傷亡規模。

第二大疑點在於「乘輿幾陷」。《明武宗實錄》的記載頗為可疑，若有其事，為何不見其他相關記載？蒙軍又為何不趁勢擴大掠奪而選擇退軍？究竟何日、何戰、何種情況、何人成功護駕等均是應見而不見。概言之，《實錄》對此戰的書寫僅是鋪陳概述，雖足以讓人清楚戰況，卻難以令人詳明其中的

<sup>38</sup> 表 1 所列幾乎都作「頗有殺傷」或「殺傷相當」，又如《綱目三編》等亦作「殺傷頗相當」。〔清〕張廷玉，《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19，頁 367。

<sup>39</sup>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 83，正德七年正月癸酉條，頁 1805。

<sup>40</sup>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 146，正德七年正月癸酉條，頁 2849。

<sup>41</sup> 後世將斬首十六視為蒙古的實際傷亡，有誤。

具體環節。相比較下，文臣們以土木之變警示武宗的言論在《實錄》中多有保存。但武宗與英宗的情況大有不同，英宗率領的是當時久未出戰的京軍，雖有些許前期準備，但未考慮後勤問題，<sup>42</sup>其偏信的王振(?-1449)又無軍事才能，加之英宗勇毅有限，且出兵衝動、行軍隨意，才導致潰敗被俘的慘果。而武宗自幼好武且膽氣較高，其統領的是常年禦敵的四鎮邊軍，總兵等二十餘名指揮又均有豐富的禦邊經驗，就連被視為奸佞的江彬(?-1521)，也兼具實戰能力。此外，應州之役的備戰、部署均比英宗親征時周密許多。在此情況下再次發生土木之變這樣本就有偶然性的極端事件，概率極低。<sup>43</sup>兵部尚書王瓊言及當時各部兵馬「相機應援，處置周密，極為有備」，<sup>44</sup>此情下，「雖遇戰，不獲大捷，惜哉！」<sup>45</sup>這為瞭解應州之役前後的軍事調度情況，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同時也表明此戰只是「未獲大捷」，非如《實錄》所記的那麼狼狽。

故筆者認為，僅憑在戰役最後加「乘輿幾陷」四字實難令人信服，並且整場戰役的傷亡數也很可能存在問題，所記可能僅為最後追擊敵人時的傷亡規模。《實錄》將此數記為整場戰役的死傷，附之「乘輿幾陷」的記載，直接抹去了明軍曾占據主動與退敵之功，其意在批判武宗任性外出，<sup>46</sup>並和蒙古進行了一場意義不大的戰爭。這與《明武宗實錄》整體的書寫傾向密切相關。

<sup>42</sup> 英宗出征的調度準備與戰略失誤，可參見川越泰博，〈土木の變と親征軍〉，《東洋史研究》，1（1993），頁24-55。此外，正統九年兀良哈征討軍的大勝，使英宗低估了此戰的難度，而實力強勁的兀良哈征討軍，也未被及時編入親征軍當中。川越泰博，〈ふたたびの「兵戈槍攘」——兀良哈征討軍と土木の變〉，《中央大學アジア史研究》，39（2015），頁45-71。

<sup>43</sup> 土木之戰的結局帶有相當的偶然性，相關討論參見李新峰，〈土木之戰志疑〉，《明史研究》，6（1999），頁115。

<sup>44</sup> [明]王瓊，《晉溪本兵數奏》，卷3，〈為緊急聲息事〉，頁112。

<sup>45</sup> [明]王瓊，《晉溪本兵數奏》，卷3，頁81。

<sup>46</sup> 李洵，《正德皇帝大傳》，頁96。

### 三、影響《明武宗實錄》書寫應州之役的因素

《明武宗實錄》在書寫應州之役的相關事件時均以否定為導向，其成因與實錄濃厚的政治性相關。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指出，實錄的纂修主要是一件政治工作，「由於監督纂修的大學士往往捲入了前朝的政治爭論，他們當然渴望將他們的個人觀點注入原文而犧牲與之對立的觀點」。<sup>47</sup>利用實錄進行政治鬥爭有三種常見情況：「一是君主干預修撰，借機貶低與自己有仇怨的前任君主，以立己威，鞏固統治；二是史臣利用修撰實錄的機會，攻擊政敵，任情褒貶；三是明末政治集團染指《明實錄》，利用該書進行政治決鬥。」<sup>48</sup>而《明武宗實錄》的纂修曾捲入前兩種鬥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曲筆現象。就影響應州之役的書寫而言，有以下因素。

首先，明世宗介入《明武宗實錄》的撰修，借此鞏固權力，並塑造其父子的仁德與權威，這就決定了《實錄》的書寫是以否定武宗為基調。世宗以旁支繼統，即位前後就圍繞入門禮、其父尊號等問題與「護禮派」文官產生爭執，最後世宗不奉孝、武為嗣統，以強硬手段尊父為帝。這些爭鬥既加劇了他與文官的隔閡，也觸動了他的敏感心理。同時，世宗與武宗有利害關係，前者的正統性稍顯不足，但他拒絕以武宗子嗣的身份繼位。內心原有的敏感與強烈的自尊交織，使世宗在諸多問題上均有其特殊的政治意圖，如其後《明倫大典》與《大明會典》的纂修，都有將「大禮議」的勝利付諸文本的目的。<sup>49</sup>而此時《實錄》的纂修正可為其所用，世宗一反實錄為先帝諱的慣例，即位後不久即「發正德間留中不報疏八百六十餘本付史局」。<sup>50</sup>將武宗扣下的諫疏交付史館，雖有據實修史、籠絡正德舊臣的意圖，卻也透露出他內心對揭露武宗的態度。魯大維 (David Robinson) 亦發現，嘉靖帝鞏固權力的一

<sup>47</sup> 傅吾康，〈明代的歷史著述〉，收入崔瑞德、牟復禮主編，《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 794-798。

<sup>48</sup> 謝貴安，《明實錄研究》，頁 25。

<sup>49</sup> 參見楊豔秋，〈明世宗朝官修《明倫大典》述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012），頁 166；原瑞琴，《大明會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 44。

<sup>50</sup> [明]張居正等奉敕撰，《明世宗實錄》，卷 8，正德十六年十一月戊辰條，頁 298。

種重要方式就是否定正德朝的政策、人事以及作風。<sup>51</sup>一些文臣本就對武宗不滿，又窺見世宗的傾向，於是大膽揭發武宗的劣跡。同時，嘉靖初期的君臣均標榜洗新弊政，對前朝批判越多，越可彰顯新君之聖明。黃雲眉所言「非世宗薄視武廟，總裁諸臣有以窺其隱衷所在，亦不敢破累朝實錄之例諱，弄此侮筆於身所經事之故帝」，<sup>52</sup>甚確。

形成強烈反差的是世宗對《獻皇帝實錄》的態度。他於《明武宗實錄》未成之際即命人修撰並無多少材料可取的《獻皇帝實錄》，並稱：

朕惟自古帝王有功德者，史臣必為實錄以藏儲金匱，傳之於子孫，其來非一日矣。我皇考穆獻皇帝聰明睿智，卓冠群倫。自奉藩以來，有河間好古之風，慕東平為善之樂，緝熙聖學，遵守祖訓，嘉言善行可以大書特書者不止一端，宜有紀述以垂憲於後世。<sup>53</sup>

從稱其父值得「大書特書者不止一端」來看，世宗對其父《實錄》的褒貶傾向與重視程度明顯高於武宗。在此基調下，史臣恐不敢寫下有礙興獻王之言。藉由形塑武宗的頑劣與獻皇帝之高尚的不同形象，世宗旨在為其父子營造更多的權威。應注意，兩部《實錄》後期的史官大致相同，且多是贊同或不反對他尊父為帝者。顯然地，世宗的態度奠定了兩部《實錄》的不同基調，而應州之役可謂武宗的高光事跡，難以避免被淡化甚至抹殺的情況。

其次，以楊廷和、費宏（1468-1535）為首的文官集團利用纂修實錄的機會，為清洗政敵、重塑文官權威提供合法依據。北京保衛戰後，文官指揮軍事之權被制度化，皇帝常處「高居深拱」的狀態，較少插手軍事。<sup>54</sup>武宗自封「大將軍」，統領邊軍，實有擺脫朝臣約束與重握兵權的雙重寓意。對此，文官們既擔心武宗重蹈英宗覆轍，又不滿他脫離為君之道，憂懼其下的武將、宦官勢壓文臣。正德朝正是文官權威驟降的時代，宦官、武臣相繼弄權，且武宗對文臣的勸諫多不以為然，還動輒杖責臣下，皆使文官大失尊嚴。文臣

<sup>51</sup> 魯大維（David Robinson）著，楊柳青、康海源譯，《神武軍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頁 229。

<sup>52</sup> 黃雲眉，《明史考證·武宗紀》，頁 156。

<sup>53</sup> [明]張居正等奉敕撰，《明世宗實錄》，卷 49，嘉靖四年三月甲戌條，頁 1238。

<sup>54</sup> 黃群昂，〈明代兵部尚書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9），頁 161。

們的不滿早有端倪，武宗死後，楊廷和迅速拆毀豹房，世宗發正德朝留中奏疏的行為，也源自他「示戒於後世」的意見：

數年以來，權奸錢寧、張銳、江彬相繼用事，曲為蒙蔽，一切皆留中不發。今幸聖明嗣統，光復舊章，敕修先朝實錄，前項章疏，事皆已往，新政以來亦多施行，不用發抄覆議，俱乞發出該科徑送史館，則事雖不得正於當時，猶可示戒於後世。忠雖不得效於前帝，猶可顯白於今日，豈不足為皇上新政之助，與後來臣子之勸哉。<sup>55</sup>

楊廷和將所有過失歸於權奸，透露出他意圖為正德時當國的自己卸除責任，以及將其忠誠「顯白於今日」的心態。張岱（1597-1684）言：「正德編年，楊廷和以掩非飾過」，<sup>56</sup>即指此事。此外，正德時一度「事無大小，白彬乃奏」的情況讓在「弘治中興」時深受信任的文官集團陷入被架空的境地。<sup>57</sup>嘉靖初，文臣們為扭轉窘境，在貶壓武宗及其寵臣等問題上達成潛在「共謀」，「豹房勢力」也被迅速清洗。從上述的政治情勢來看，我們有理由相信《明武宗實錄》的書寫背後暗藏了政治鬥爭。<sup>58</sup>記述武宗等人越多劣跡，越可撇清關係，借此清洗政敵、提升自身威望。雖然楊廷和等人在嘉靖三年因「大禮議」辭官，但《明武宗實錄》的基調早已奠定，接任史官的內心取向及迎合世宗的心理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此一來，《明實錄》對皇帝「止書美而不書刺，書利而不書弊」的原則在《明武宗實錄》幾乎顛倒。<sup>59</sup>應州之役正是在這樣的傾向下被書寫的，實難脫離消極的論調。

再次，武宗出征時「只率將卒，朝無一人扈從」，<sup>60</sup>這意味著文官們多未親歷戰爭。只是為防止冒濫軍功，文臣們才於戰後一月請派御史前往戰場查

<sup>55</sup> [明]楊廷和，《楊文忠三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2，〈請發留中章奏疏〉，頁780-781。

<sup>56</sup> [明]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嶽麓書社，2016），卷3，〈徵修明史檄〉，頁79。

<sup>57</sup>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370，〈江彬傳〉，頁7887。

<sup>58</sup> 其中亦有文臣之爭，如王瓊與廷和同為經世濟國之臣，卻相互爭權。王瓊於嘉靖初被中傷戍邊，《明武宗實錄》抹殺了他治漕、整軍、平叛、除奸等方面的功績，而王瓊對應州之役的客觀評價，也隨之遭到淹沒。在《明世宗實錄》及後世的記載中，王瓊之功才被鄭重審視。

<sup>59</sup> [明]李建泰，〈名山藏序〉，收入[明]何喬遠，《名山藏》，頁3。

<sup>60</sup> 《朝鮮中宗實錄》，卷31，收入《朝鮮王朝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9），冊21，中宗十二年閏十二月丙子條，頁238。

勘「何官設謀奮勇，禦賊有功」，然武宗曾親臨前線，殊覺不必，更不願在封賞一事上受制於人，故降旨「免查勘」。<sup>61</sup>朝臣們對此戰的詳情確實難有更多瞭解，而兵部尚書王瓊所言，既代表了文臣們對武宗調用大量資源而未獲大捷的遺憾，也透露此戰僅是未得大捷，並非如《實錄》所記的那麼狼狽。但武宗的叛逆、文臣在正德朝的窘境及大臣們對應州之役封賞過濫、所費不償的看法，也令他們不滿。加上土木之變給明朝官員留下的創傷記憶，使得中晚明的文臣不免將皇帝出征看作動搖國本的威脅。如許宗魯（1490-1559）作有《土木行》，首先闡述了英宗受難之慘，接著建立「後來武宗亦頻出」與前者的聯繫，雖有肯定「六師狼狽非前日」，但強調的是：「君不見，虞庭兩階舞干羽，漢武輪臺徒自苦。垂衣端拱頌無為，何必親御沙場耀神武！」<sup>62</sup>可見，明初順理成章的御駕親征，此時也不再具有合法性。在上述情況下，明軍打平或小勝，在多數文官的眼裏都為失敗。歷史上有許多相似的先例，<sup>63</sup>既已有此傾向，文臣們難以不懷疑和否定這場戰役。

第四，皇城内曾流傳「帝陷沒於賊中」的謠言為《明武宗實錄》記下「乘輿幾陷」提供了依據。《李朝實錄》提及武宗北征後衍生諸事，部分訛言為明朝史料所未見。據當時的朝鮮使節孫仲墩（生卒不詳）所報：

一日，有一人來言於館所曰：「天子陷於賊中，見拘於韃子。韃子謂中國曰：『若許銀十萬，則可以贖還』云。」臣以為萬無是理也。然天順皇帝曾陷於賊中，無乃有此理乎？即遣通事于禮部而問之，則外郎等曰：「此言何自而出乎？」且觀禮部中郎官，則行公自若，無異平日。

<sup>61</sup> [明]王瓊，《晉溪本兵數奏》，卷3，〈為緊急聲息事〉，頁112。

<sup>62</sup> [明]許宗魯，《少華山人前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卷4，〈土木行〉，頁495。

<sup>63</sup> 如漢武帝令李廣利兩征大宛。首敗後，「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但武帝執意出征，並處置了持不同意見的鄧光等人。現今學界對此戰雖不乏積極評價，但在西漢時，像「大興師伐宛，曆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不戰而物故者半，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等負面評價則屢見不鮮。參見〔西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123，〈大宛列傳〉，頁3176；〔西漢〕桓寬著，王利器校，《鹽鐵論校註》（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8，〈西域第四十六〉，頁501；〔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70，〈陳湯傳〉，頁3017。

然而訛言則經三四日而不止矣。一日都中人騷擾，聲言曰：「皇太后升遐，而不知天子所在之處，……」則亦訛言也。……皇帝居外之事的實，而其餘皆是訛言。<sup>64</sup>

可見，武宗征戰應州前後，皇城內外謠言四起，甚至波及了太后。此時確如使節所言：「訛言洶洶，莫知端倪。」<sup>65</sup>尤其韃靼俘虜武宗進行索價的訛言既無根據也不合情理。謠言雖浮誇，但文官們對皇帝險遭俘虜多寧願信其有而不願信其無，這不僅能印證他們事前的擔憂，還能營造出帝王應聽取文官建議的基調，同時也能為清算江彬等人及重塑文官權威提供堅實的依據。

最後，武宗等人歷來玩世不恭的行為，也為後世貶低或批判他們提供了口實。武宗的才智用在了皇帝角色所不被認可的領域，故文臣們始終以聖王標準諫之，期望他能「舍豹房而居大內，遠嬖倖而近儒臣」、「還邊兵於故伍」、「汰倉局門戶之內官」、「出留中奏牘以達下情」等等。<sup>66</sup>但武宗衝決文臣期許的叛逆精神卻日甚一日，愈發脫離文官期望他「充擴天理，遏絕人欲，深居九重，恭默思道」的為君之道，<sup>67</sup>因而文臣們批評武宗亦不為奇。為避免再現「失控之君」，明中後期的文官們也時常通過批判武宗的負面形象來戒後人，同時在諸多問題上力爭是非，意圖將後世的天子重新納入文官集團所認可的秩序當中。這也是楊廷和等人在嘉靖初年固執己見，與世宗產生諸多矛盾的重要緣由。<sup>68</sup>

應州之役正是在這樣的皇帝，以及被視作奸佞的江彬等人的導引下開展的，於戰前就已被扣上了任性妄為的帽子，加上武宗縱樂與戰爭所費不償、封賞過濫的情況確實存在，文臣們很容易將土木之變和對武宗等人的負面印象影射到戰役當中。如此，不論戰果如何，文官們事後的評價必然不高，這也

<sup>64</sup> 《朝鮮中宗實錄》，卷 31，中宗十二年閏十二月丙子條，頁 238。

<sup>65</sup> 《朝鮮中宗實錄》，卷 31，中宗十二年閏十二月丙子條，頁 238。

<sup>66</sup>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188，〈徐文溥傳〉，頁 4990。

<sup>67</sup> [明]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171，〈隆聖孝以答人心疏（諫止北狩）〉，頁 1748。

<sup>68</sup> 最典型的就「護禮派」反對世宗尊其父為帝。儘管世宗與文官們有諸多矛盾，但後者普遍對武宗沒有好感卻與世宗相一致。後期修《明武宗實錄》與《獻皇帝實錄》的官員，又多是世宗根據是否助其「議禮」而更換的，這樣，史官們與世宗的態度便更趨一致。

是武宗自身行為產生的結果：被視為荒誕的皇帝，生前身後遭受無數批評。這確如謝貴安所言：「實錄作者對皇帝形象的增飾和塑造，既依據自身所處政治環境的需要，也遵照實錄傳主的性格特徵和基本經歷來進行，表明了史學本質是主觀性與客觀性之間共進與互動的關係。」<sup>69</sup>

以上幾點影響應州之役書寫的因素中，既有此戰的特殊性，也有《明武宗實錄》書寫傾向的普遍性。如世宗的態度、文臣的傾向及武宗自身的個性行為，是影響整個《明武宗實錄》書寫的最主要因素，反映出正、嘉兩朝政治變動中嘉靖朝君臣的某種「共謀」，不只體現於應州之役的書寫。

#### 四、示戒與懲過：《明武宗實錄》書寫特徵的多重面相

由官方編纂的《明實錄》被視作「國史」，其中有詳略、有真假、有主觀、亦有客觀，但共同點在於：在各朝實錄的文字記述中，都多少蘊含著編纂者的政治立場，即便其立場對於文字記述的影響程度不一。其中，《明武宗實錄》在此方面較為凸出，湯斌就曾指出，「武宗實錄作於世宗初年，操筆者多忌功爭名之輩」，不乏曲筆，未可盡信。<sup>70</sup>結合應州之役相關史事及其他事件的記載，可提煉出《明武宗實錄》主要的書寫特徵。

其一，《明武宗實錄》以直接揭露和否定武宗為主要傾向。例如在正德九年（1514）乾清宮失火處寫道：「上自即位以來，每歲張燈為樂，所費以數萬計，廣貯黃白蠟不足，復令所司買補之。」此處於敘事前便已揭露武宗貪玩成性、揮霍無窮。其後武宗不僅接受寧王所獻奇巧，還「於宮廷中依簷設毬幕，而貯火藥於中」，最後「偶勿戒，遂延燒宮殿」。當象徵皇權的乾清宮「火焰燭天」時，武宗卻「戲謂左右曰：『是好一棚大煙火也！』」<sup>71</sup>該記述既直接

<sup>69</sup> 謝貴安，〈試述《明太祖實錄》對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學術研究》，5（2010），頁97。

<sup>70</sup> [清]劉承幹，《明史例案》（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4，〈湯文正明史凡例議〉，頁587。

<sup>71</sup>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108，正德九年正月庚辰條，頁2204。

揭露出武宗的醜行，還悄然增入了撰寫者的批判。其後一條載武宗下諭罪己，更具諷刺意味：

朕恭承天命，嗣守祖宗成業，夙夜孜孜，勉圖治理，乃者乾清宮災，朕心驚惶，莫知攸措！殆以敬天事神之禮有未能盡，祖宗列聖之法有未能守；用舍或有未當；……諂諛並進，而直言不聞；賄賂公行，而政體乖謬；奸貪弄法，而職業多未能修；撫剿失宜，而盜賊尚未見息，有一於此，皆足以傷和致災。靜言思之，悔悟方切！<sup>72</sup>

此諭或為武宗面對壓力下作出的悔悟之言，與前文玩火縱樂形成鮮明的反差，當嘉靖朝的文臣們在《實錄》中凸顯武宗的這兩個行為時，並非肯定他事後「罪己」擔責，而是凸顯其玩物喪志、不辨是非，乃至是不思悔改的負面形象。成書於嘉靖初的《繼世紀聞》載此事雲：「乾清宮火，上親督午門，傳旨侍衛官兵入救」，未書武宗戲語，但言武宗親督救火，且其後言武宗「下詔責咎，深切時弊」，尚帶有肯定武宗的論調。<sup>73</sup>或許如黃雲眉所言：「蓋外間所記，只能如此。」<sup>74</sup>但《實錄》不為武宗諱而強化其負面形象的意圖，於此對比下尤為顯著。同時，《明武宗實錄》不僅記載了大量武宗缺勤致使「郊期屢更」之事，且不做任何辯解。直到他瀕危時，才出現如「上以疾，不視朝」等在其他實錄中常用的諱飾。<sup>75</sup>武宗醉心巡獵活動，或有過度之時，但巡獵在明中期以前本就是明廷統治及其象徵建構的組成部分，《實錄》將武宗所行完全描述成脫軌的行為，歪曲了部分事實。《實錄》中尚有諸多揭露武宗沉迷武事、佞佛和享樂等內容，不乏過分醜化之處。<sup>76</sup>至於應州之役的書寫，則是對武宗出征的否定，以及對戰爭「所費不償」、「封賞過濫」的單方面貶低。雖然，在揭露與強化皇帝的負面形象方面，《明武宗實錄》並非首例。在兩經「整修」的《明太祖實錄》中，朱棣及其史臣通過對燕王的美化與對朱允炆（1377-1405?）的詆毀，營造了太祖「欲立燕王」及朱允炆「矯詔嗣位」

<sup>72</sup>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108，正德九年正月壬午條，頁2205。

<sup>73</sup> [明]陳洪謨，《繼世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5，頁98。

<sup>74</sup> 黃雲眉，《明史考證·武宗紀》，頁156。

<sup>75</sup>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196，正德十六年二月甲午條，頁3659。

<sup>76</sup> 前人對此曾有梳理，參見朱燕鈴，〈明武宗形象演變研究——《明武宗實錄》與明清其他載籍的比較〉（武漢：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1）。

的政治語境。<sup>77</sup>又如《明英宗實錄》對「廢帝郕戾王」的醜化亦是「曲筆為多」，故言「實錄難據」。<sup>78</sup>然而，《明武宗實錄》對武宗的書寫方式，恐怕是除建文、景泰帝外，其他實錄所不會呈現的。

其二，在揭露劉瑾(1451-1510)、焦芳(1435-1517)與江彬等武宗寵臣時，《明武宗實錄》亦不留餘力。如其在評劉瑾時曰：「瑾竊柄五年，驕橫無上，生殺予奪皆自己出，累朝成憲變易幾盡，自古宦官肆虐未有如瑾之甚者。」<sup>79</sup>劉瑾固然罪惡，但與長期掌握皇帝廢立生死的唐代宦官相比，豈是自古肆虐最甚？況其「變易成憲」亦在政治上有所貢獻。<sup>80</sup>但凡曾依附於瑾、彬等人者，劣跡多被凸顯；凡不與文臣合作者，多被冠以「無它才略」等名；凡如瑾、彬等遭清洗者，無不例外的被冠以「反形已具」，尤其對劉瑾「又造偽璽，藏刀扇中」的記載，<sup>81</sup>充分展現了皇權時代以史筆遂行政治清算的方式。此種書寫恐因劉瑾等人得罪甚廣，<sup>82</sup>文臣們又對其隔絕外廷、侮辱文官等行為深惡痛絕，於是將他們的主觀認知放大。需注意，批判武宗寵臣亦是間接批評武宗，且可與之劃清界限，突出文臣們的正直，也為反擊政敵提供依據。這樣的政治報復方式在《明實錄》中普遍存在，如《明太宗實錄》對建文舊臣的批判、劉吉在《明憲宗實錄》中對劉珣的抹黑與焦芳在《明孝宗實錄》中對何喬新的詆毀等均有體現。<sup>83</sup>

<sup>77</sup> [明]李景隆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卷 217，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戊寅條，頁 3195；[明]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卷 1，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條，頁 5。可參見謝貴安，〈試論《明實錄》對建文帝的態度及其變化〉，《北京聯合大學學報》，3 (2010)，頁 30-37。

<sup>78</sup>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2，〈實錄難據〉，頁 61。

<sup>79</sup>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 66，正德五年八月戊申條，頁 1460。

<sup>80</sup> 廖心一，〈劉瑾「變亂舊制」考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輯 3，頁 161。

<sup>81</sup>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 66，正德五年八月戊申條，頁 1460；[明]費宏等奉敕撰，《明世宗實錄》，卷 3，正德十六年六月戊子條，頁 122。

<sup>82</sup> 如《明武宗實錄》前後兩任總裁楊廷和與費宏均曾受劉瑾等人的排擠。

<sup>83</sup> 參見謝貴安，〈試述《明太宗實錄》對建文帝形象的描寫與塑造——兼論傳統史學的曲筆與直書問題〉，《學習與探索》，1 (2011)，頁 219-222；蔡果利，〈試論《明實錄》對劉珣的書寫——兼談《明實錄》編寫之失〉，《中國典籍與文化》，4 (2016)，頁 40-49；焦芳修實錄所為，參見謝貴安，《明實錄研究》，頁 30。

其三，《明武宗實錄》的編纂者片面地批判各類正德朝改制之事。其實豹房之設蘊藏著武宗重振明初尚武傳統的期望，以及他欲求自主施政、抑制文臣干涉的多重動機。豹房官廨一度成為當時的政治中心和軍事總部，使得大內朝廷形同虛設，文官的權勢也大為降低。然而豹房作為武宗應對軍、政統禦需求的憑藉，以及他藉此抑制文臣干涉皇權的作用，往往被官方典籍所隱諱。文官們不僅難以認同武宗建造豹房的動機，而且有意強化其中享樂的一面，成功引導了後人對「豹房政治」的看法。<sup>84</sup>又如，正德初變革河南等地鄉試解額及南北中卷制度、更改武舉開科時間、裁革傳奉庶起士等，皆被作「變亂舊章」。<sup>85</sup>這些批評雖有一定的事實依據，但其他時期亦不乏改動科舉成例的相似做法，那些實錄中多不會出現「變亂舊章」、「隳法制，辱科目甚矣」等營造負面印象之詞。對此，劉小龍認為《明武宗實錄》的史官不僅積極營造了正德朝違背科舉舊制的印象，且有故意削弱其科舉政策積極影響的傾向。<sup>86</sup>故劉瑾「變法」中雖不乏積極的貢獻，但《實錄》卻完全否定。同樣在變更祖制上大做文章的是《明太宗實錄》，建文朝不乏惠政，但朱棣「靖難」後以「改更成憲，戕害諸王」等理由對其進行了全面否定。<sup>87</sup>這與後來的嘉靖朝一樣，均旨在否定改制的君臣，削弱前朝的政治影響，並為自己的帝位與新政營造更多的合法依據。

其四，以記錄更多文官的諫阻，減少不利於文官的用詞為取向。《明武宗實錄》中保留了過多相似的文臣諫疏，比例失衡。以應州之役為例，相比對戰況的簡記，戰前文臣以土木之變諫阻武宗的論述則大量保存在實錄中：給事中石天柱（1474-1525）等言：「北虜近年來其勢愈甚，而吾亡卒多為之嚮導，……萬一有奸邪結虜，敢為內應如己巳土木之變，其何以禦之？」<sup>88</sup>梁儲

<sup>84</sup> 蓋傑民（James Geiss）曾嚴密論證了豹房的政治、軍事作用，包括史官對武宗及其豹房活動的有意曲解。參見蓋傑民，〈明武宗與豹房〉，《故宮博物院院刊》，3（1988），頁12-19。

<sup>85</sup>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36，正德三年三月壬戌條，頁868；同書，卷66，正德五年八月辛丑條，頁1448；同書，卷67，正德五年九月癸酉條，頁1486。

<sup>86</sup> 劉小龍，〈皇權與史權的合轍與分途：《明實錄》中科舉的歷史書寫與權力話語〉（武漢：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9），頁159。

<sup>87</sup> [明]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卷10，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戌條，頁143。

<sup>88</sup>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153，正德十二年九月甲戌朔條，頁2954。

言：「此虜詭計難測，且覘知聖駕在外日久，僭結醜類，接續而來，其眾甚多。……乞敕隨駕官軍特重堅守，決不可輕出接戰及貪功逐力，以致墮虜計中」。<sup>89</sup>吏部尚書陸完（1458-1526）等人所言：「昔我英宗親出禦虜，彼時軍馬三十餘萬，尚有土木之變。陛下自視今日軍馬強弱何如往昔，而顧欲輕出耶？」甚至有恐嚇意味。<sup>90</sup>總之，每當武宗「好動」之時，則必有諫阻之臣。《明神宗實錄》中亦留有大量文臣諫疏，且毫不諱飾地記載了鄒元標（1551-1624）等人對神宗之虛偽及染上「酒色財氣」的批判。<sup>91</sup>應注意，神宗同樣與朝臣長期對立，且其實錄亦未遵循子為父修的慣例。這些奏疏一方面展現出正德朝文官憂國憂民的品質，另一方面也訴說著他們對皇帝獨斷專行的無奈，而非他們沒有直言極諫。如此，嘉靖初年的文臣們即可彰顯他們在武宗朝以「道」抗「勢」的精神，並藉此撇清自身與前朝弊政的關係。

對文臣不利之言也多被刪去或轉換。如《實錄》記載武宗一次與文臣爭論時說：「天下事豈專是內官壞了？譬如十個人中也僅有三四個好人，壞事者十常六七。」<sup>92</sup>約與《實錄》同期成書的《繼世紀聞》所載，則透露出武宗直接批評的是當朝文官：「豈獨此數人壞事？文官亦有不好的！譬諸十人，豈能皆賢？亦未免有四五人壞事者耳。」<sup>93</sup>原能看出武宗在回護宦官時，亦能較辯證地看待朝中文官的優劣情況。《明史》和《明通鑑》同樣保留了武宗批評「朝臣」的字樣：「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sup>94</sup>然觀《實錄》所載，在抹去了「文臣」、「朝臣」此類直攻文官之語時，令人產生武宗為宦官批判全天下的觀感，從而強化了武宗的執拗。這說明歷史文本具有局限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記錄者自己的歷史記憶，「撰寫歷史的文化霸權既然掌握在精英的手中，他們就必然要用這種霸權來傳播

<sup>89</sup> [明] 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 154，正德十二年十月乙未條，頁 2967。

<sup>90</sup> [明] 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 151，正德十二年秋七月壬辰條，頁 2932。

<sup>91</sup> [明] 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第 218，萬曆十七年十二月甲午條，頁 4085-4087。

<sup>92</sup> [明] 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 17，正德元年九月辛卯條，頁 515。

<sup>93</sup> [明] 陳洪謨，《繼世紀聞》，卷 1，頁 71。

<sup>94</sup> [清]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181，〈劉健傳〉，頁 4816；[清] 夏燮，《明通鑑》，卷 41，正德元年九月戊寅條，頁 1558。

他們的觀點，而把其他方面的記憶刪除。」<sup>95</sup>對文官們而言，武宗等人並非值得推崇之人，因此對他們的歷史記述也更多地保存著負面的東西，而將影響自身權威的記憶重構或剔除。此類微妙差異，實則暗藏著修撰者的立場與傾向。

最後，《明武宗實錄》對武宗等人的書寫是基於現實基礎上的主觀強化。雖其通常依據部分的客觀事實，但在敘述與細節中卻表露批判武宗等人的傾向。如上文武宗責臣、乾清宮火、應州之役等事，均是在事實基礎上於記述選擇、書寫方式上凸顯武宗的負面形象。但《實錄》亦非全盤批判武宗，在記載其不禦殿試、經筵等情況時多是據實而書，只是不為武宗做任何諱飾罷了。此外，《實錄》中亦有肯定武宗的記述，如劉瑾伏誅，若無武宗「親籍其家」的決心，僅憑張永（1465-1528）等人的揭露亦無以成事，《明武宗實錄》於此亦肯定武宗「去之不疑，卒能正其法，由上之英斷也。」<sup>96</sup>只是肯定之處極為鮮見，且帶有濃厚的政治偏向。<sup>97</sup>

綜上所言，歷史的書寫雖與人們的價值取向密切相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於客觀事實。武宗不羈的行為正是《實錄》據以批判他的客觀依據，以及由此強化其負面形象的現實基礎，關於應州之役的書寫亦是如此。然而，該戰或是武宗的高光時刻，文臣們雖欲否定它，卻也無法完全無視其退敵的事實，故仍呈現武宗「親督軍」、「敵退」的現象，惟在文末加上頗可存疑的傷亡情況與「乘輿幾陷」，附之對戰爭前後的記述，仍構成了頗具反向效果的文本話語，連帶地否定了應州之役。此種書寫筆法與嘉靖朝君臣否定正德朝施政、用人的心態相互呼應。因此，《明武宗實錄》雖依客觀事實，但仍以強調文官的正直與遠見，以及突出武宗等人的任性與荒唐這兩大帶有主觀性的書

<sup>95</sup> 趙世瑜，〈傳說·歷史·歷史記憶——從 20 世紀的新史學到後現代史學〉，收入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頁 122。

<sup>96</sup> [明]楊士奇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 66，正德五年八月戊申條，頁 1460。

<sup>97</sup> 《大行皇帝尊諡議》及《武宗毅皇帝實錄序》是實錄中少有褒獎武宗的文字，贊其「天性英明，剛而能斷」。朱燕鈴討論了前者，體察出《武錄》對武宗形象的歪曲及編撰者內心對武宗的抵觸。李谷悅認為，世宗肯定武宗剛斷等內容與「大禮議」的背景相關，耐人尋味。參見朱燕鈴，〈明武宗形象演變研究——《明武宗實錄》與明清其他載籍的比較〉，頁 39-40；李谷悅，〈從《明實錄》序文看明代政治文化〉，《原道》，2（2017），頁 65。

寫基調為主。這反映正、嘉兩朝局勢變動下《明武宗實錄》所獨具的書寫特徵，也從一側面體現了前揭明代各朝實錄中諸多具有共性的問題。其他朝的《實錄》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過政治鬥爭的影響，但對應的方面和呈現的形式卻未盡相同，《明武宗實錄》則幾乎彙集了其他《實錄》存在過的問題，故能成為透視實錄修纂與朝局變遷關係的有力視點。

## 五、結論

明武宗作為「弘治中興」的後繼者、世宗皇帝的前任，他性格乖張、行為不羈，在位時又寵幸權閹，任用小人。故而，對武宗及其寵臣負面形象的強化，不僅能加強世宗即位與推行新政的合法性，還能夠塑造其父的品格營造強烈對比。文官們亦能彰顯其「格君心之非」的努力，借此清洗政敵、開脫與前朝弊政的關係，進而重塑文官集團的權威。這可窺見於《明武宗實錄》的書寫特點，其著力否定武宗、批判正德改制，堆砌文官諫疏、轉換褒貶用詞的書寫傾向和諸多細節，反映出正、嘉兩朝政治變動中世宗與文官集團的某種政治「共謀」。

以應州之役為例，該戰的確「所費不償」與「封賞過濫」，但《實錄》所記絕非整場戰役的傷亡，很可能僅為最後追擊戰中的規模。再綜合《明武宗實錄》的自相矛盾、王瓊與《李朝實錄》的記載等情況，「乘輿幾陷」也並非事實。當然，武宗出征時「朝無一人扈從」，事後又免去軍功查勘，使明廷本就缺乏戰情備案，加之各方史料均有不足，故僅靠現存材料或許還無法對此戰的傷亡作出定論。但嘉靖朝君臣貶抑武宗等人的取向，於此對比下卻尤為凸顯。從表面上看，人們對應州之役的看法始終與土木之變的創傷記憶相互連帶。文臣們不斷以土木之變警示武宗，且將皇帝受難的可能投射於應州之役。但更深層的是，兩戰的歷史敘述都被用於服務特定的政治目的。文官們借土木之變呼籲「垂衣端拱」的皇權統治形式，並通過反對武宗親征和書寫正德史事，重新界定皇帝的政治角色，宣誓文官集團的既得權力。相反，武

宗對軍事、田獵和獸苑的興趣，與其復歸明初尚武統治的期望一脈相承。<sup>98</sup>他自封「大將軍」，統軍征戰，封賞軍功，更是含有擺脫朝臣約束與重掌兵權的多重動機。只是這些在明初順理成章的活動，已越發難以被朝臣接受。當時客觀評價應州之役的聲音，也隨之淹沒。魯大維發現，從 16 世紀初開始，一種沒有言明的、長期存在的把狩獵等同於游牧及「他者」的觀念，在歷史記載中變得越來越清晰。<sup>99</sup>世宗的登基，昭示著明朝政治文化的一次真正轉變：「主靜」的為君之道被視作有序政治的基礎，「好動」的行為則深受批評。武宗以後的明朝皇帝均被迫「深居九重」，便是此一政治轉向的產物。

可見，應州之役的書寫還關涉一套歷史記憶的選擇與再造，這種建構有其形成的內外情境。由於武宗等人要為正德朝的「失德」負責，且應州封功確有冒濫，加上京城曾有皇帝「見拘於韃子」的謠言，於是文官們順此思路，淡化前者的戰場功績，進而否定整場戰役，是為其外在情境。嘉靖朝修實錄，世宗為塑造新政及其父子的權威，文官集團又意圖借此清洗政敵、重拾權威，從而對武宗等人加以普遍否定，這構成其內在情境。內外因素的結合，為《明武宗實錄》的撰修及應州之役的書寫奠定了基調，而這正是嘉靖朝君臣所期望達到的效果。

本文並非為武宗「平反」，相反地，筆者認為《實錄》對武宗等人負面形象的強化，恰恰建基於他們脫離規範的行為上。但就應州之役而言，確需審慎考辨。由於《明實錄》在修纂過程中，前帝與後帝，皇帝與大臣，大臣與史官都存在著各種矛盾和利益衝突，<sup>100</sup>於是在塑造皇帝形象時，也就出現了美化（如太祖、成祖、仁宗）與醜化（如建文、景泰、武宗）等分途。這說明史官固然有追求客觀歷史的意識，但也應注意歷史的編纂受政局等因素的影響，使編纂者多少會受其立場的制約和導向，甚至某些時候會片面的選擇與運用史料，或於細微處著手，以達到淡化甚至抹殺一些歷史事件與人物的目的，從而構建符合當下利益訴求的歷史記述。而唯我獨尊的皇帝，既可能是其中的

<sup>98</sup> 參見蓋傑民，〈明武宗與豹房〉，《故宮博物院院刊》，3（1988），頁 12-19。

<sup>99</sup> 魯大維，〈神武軍容耀天威〉，頁 230。

<sup>100</sup> 謝貴安，〈明清實錄對皇帝形象塑造之比較〉，《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2018），頁 19。

構建者，也可能是被構建者；其形象既有真實的一面，也有被塑造的一面。這不僅在《明實錄》中較為常見，而且在中國古代都可能是普遍現象。

本文於 2023 年 5 月 3 日收稿；2023 年 8 月 31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江昱緯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漢〕桓寬著，王利器校，《鹽鐵論校註》，北京：中華書局，1992。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明〕李景隆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明〕陳文等奉敕撰，《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明〕張居正等奉敕撰，《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北京：現代出版社，1991。
- 〔明〕王瓊著，張志江點校，《晉溪本兵敷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明〕申時行等修，〔萬曆〕《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9。
- 〔明〕何喬遠，《名山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 〔明〕佚名著，珠榮嘎譯，《阿勒坦汗傳》，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4。
- 〔明〕李贄，《續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明〕茅元儀，《武備志》，臺北：華世出版社，1984。
- 〔明〕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嶽麓書社，2016。
- 〔明〕梁儲，《鬱洲遺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5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許宗魯，《少華山人前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103，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 〔明〕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明〕陳建，《皇明通紀》，北京：中華書局，2008。

- 〔明〕陳洪謨，《繼世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明〕楊廷和，《楊文忠三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2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薩囊徹辰著，道潤梯步譯校，《新譯校註蒙古源流》，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 〔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
- 〔清〕馬齊等奉敕撰，《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吳輔宏纂修，〔乾隆〕《大同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冊 4，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據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修、四十七年（1782）重校刻本影印。
- 〔清〕房裔蘭纂修，〔雍正〕《陽高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冊 7，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據民國鉛印本影印。
- 〔清〕夏燮，《明通鑑》，北京：中華書局，2014。
- 〔清〕張廷玉，《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4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清〕陳鶴，《明紀》，上海：中華書局，1936，據江蘇書局刻本校刊。
- 〔清〕嵇璜等奉敕撰，《續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 〔清〕劉承幹，《明史例案》，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輯 5 冊 4，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民國四年（1915）劉氏嘉業堂刻本影印。
- 《朝鮮中宗實錄》，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冊 21，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9。
-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 朱風、賈敬顏譯，《漢譯蒙古黃金史綱》，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

## 二、近人論著

于默穎，《明蒙關係研究：以明蒙雙邊政策及明朝對蒙古的防禦為中心》，呼和浩

- 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5。
- 川越泰博，〈ふたたびの“兵戈槍攘”——兀良哈征討軍と土木の變〉，《中央大學アジア史研究》，39（2015），頁 45-71。
- 川越泰博，〈土木の變と親征軍〉，《東洋史研究》，1（1993），頁 24-55。
- 朱燕鈴，〈明武宗形象演變研究——《明武宗實錄》與明清其他載籍的比較〉，武漢：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1。
- 吳琦、趙秀麗，《明代「問題皇帝」研究——一項基於社會類群的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 吳豔紅主編，《明代制度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 李谷悅，〈從《明實錄》序文看明代政治文化〉，《原道》，2（2017），頁 60-71。
- 李洵，《正德皇帝大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
- 李洵，〈讀《明武宗實錄》條記〉，《明史研究》，1（1991），頁 131-140。
- 李新峰，〈土木之戰志疑〉，《明史研究》，6（1999），頁 112-118。
- 原瑞琴，《大明會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 時蓉華，《社會心理學辭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 崔瑞德、牟復禮主編，《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 黃雲眉，《明史考證·武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9。
- 黃群昂，〈明代兵部尚書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9。
- 喬治忠、楊豔秋，〈《四庫全書》本《明史》發覆〉，《清史研究》，4（1999），頁 67-73。
- 楊豔秋，〈明世宗朝官修《明倫大典》述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012），頁 166-172。
- 廖心一，〈劉瑾「變亂舊制」考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輯 3，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頁 139-166。
- 蓋傑民（James Geiss），〈明武宗與豹房〉，《故宮博物院院刊》，3（1988），頁 12-19。
- 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 劉小龍，〈皇權與史權的合轍與分途：《明實錄》中科舉的歷史書寫與權力話語〉，武

漢：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9。

蔡果利，〈試論《明實錄》對劉珣的書寫——兼談《明實錄》編寫之失〉，《中國典籍與文化》，4（2016），頁 40-49。

魯大維（David Robinson）著，楊柳青、康海源譯，《神武軍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薄音湖，〈達延汗生卒即位年考〉，《中央民族學院學報》，4（1982），頁 66-70。

謝貴安，《明實錄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謝貴安，〈明清實錄對皇帝形象塑造之比較〉，《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2018），頁 10-19。

謝貴安，〈試述《明太宗實錄》對建文帝形象的描寫與塑造——兼論傳統史學的曲筆與直書問題〉，《學習與探索》，1（2011），頁 219-222。

謝貴安，〈試述《明太祖實錄》對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學術研究》，5（2010），頁 97-105。

謝貴安，〈試論《明實錄》對建文帝的態度及其變化〉，《北京聯合大學學報》，3（2010），頁 30-37。

寶音德立根，〈達延汗生卒年、即位年及本命考辨〉，《內蒙古大學學報》，6（2001），頁 1-9。

An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iographic Record in  
Light of Emperor Wuzong's Military Defense of  
Yingzhou, as well as an Assessment of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Wuzong Reign*

Sun, Yan\*

In the twelfth year of the Zhengde reign, the Wuzong Emperor personally led his troops to Yingzhou in defense against the nomadic tribes. However, the editors of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Wuzong Reign* thought that this war was unremunerative, presented few achievements, and put the emperor in danger. After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Wuzong Reign* and other historical sources,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assertion, “Emperor Wuzong was nearly captured by the enemy” is not factual and that there remain many doubts about the level of casualties. Moreover, Emperor Wuzong was deemed responsible for the “lack of moral governance” during his reign, and there were rumors in the capital that the emperor had been captured. Thus, the compilers followed this line of thinking and downplayed Wuzong's accomplishments.

In shaping new policies and assuming power from his father, Emperor Shizong directed his ambitious officials who themselves desired to purge their political opponents, to expose Wuzong's negative image and criticize his every reform in their writing of the *Veritable Records*, during which they emphasized their own integrity and vision. In this respect, the *Veritable*

---

\* PhD Candidate, Academy of History, Ren 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ecords* embody the simultaneous interweaving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views and reflect the political changes of the Zhengde and Jiajing reign as well as the attempts of Emperor Shizong and his officials to shape the memory of the previous reign.

**Keywords:** Yingzhou Warfare, *Veritable Records of Ming Wuzong*, Ming Historiography, New Jiajing Policies, military affairs